

江青访谈

1972年夏，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到中国访问。维特克请求会见江青，交谈时间长达60多个小时。当时的外交部陪见人员之一张颖提供了会谈摘录，因张颖描述的会谈前后过程多有伪造篡改，故忽略，读者可以参阅余汝信的考证文章。

两人谈话又开始了。

下面是我摘录的当时的部分谈话记录。可能有点乏味，文字也不流畅，但这是真实的记录。

1972年8月25日下午6时30分至26日凌晨3时40分。

江青：“你好吗？听说你急着要走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将30日离开中国，自从两星期前见到你以后，对时间的概念已不清楚了，不知今天是星期几，是几号。自从上次谈话以后，我看了一些你亲自培育的戏，也读了剧本又加以研究，我感到好像进入了不同的世界。”

江青：“你只知道一个方面，你总想和我谈文艺，这只是整体的一个方面。你同样板团谈就行了。”

维特克：“有机会同样板团谈谈很重要。他们十分具体地告诉我，在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如何创造新的英雄人物，这一切具体例子非常重要，可以帮助我了解政治和文艺革命是如何实现的。这对我有很大帮助，是你给我的机会，因此我十分感激你。”

江青：“你是个聪明的人，会了解我在这方面付出了什么劳动，所以这方面不再同你谈了……”

“谈谈计划吧。我不了解你，但对你的印象是好的。我读了一个材料，说邓大姐已经见了你。我的飞机已准备起航，但我留下来了。如不见你，显得我骄傲、自满。所以临时组织了戏请你看。晚上回家，我想应该对你尽点义务。我还是起航，在这里休息了三五天，是绝对休息，记忆力有了很大恢复。这以后知道你要写本斯诺那样的书，我就有点担忧，有点替你着想了。当然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负责。我见了你五天以后替你着想了。你到底想写一本什么书？是本浮光掠影的书还是有分量的书？”

维特克：“我确实希望写本书，描写文化和政治，文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的书。如可能，想写本关于江青同志个人在改造文艺方面所起领导作用的书。过去外界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大歪曲，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误解，全然忽视文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，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方面意味着什么。”

江青：“不仅是文化革命，是一场伟大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大革命，总之是一场全面内战。我不是对你说了吗？我为你着想。斯诺比你优越的条件，因为他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。此外还与周恩来和其他老革命者谈了话。而你呢，最老的是邓颖超同志。邓大姐工作历史长，但工作角度我比你宽。我为你这本书在做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。这段历史可以生动地告诉你，可以使你了解长征和现在。但我不强加于人，你如不喜欢军事，我们就不谈，你愿谈什么就谈什么，你问的其他问题我没有准备，但我们可以漫谈。”

维特克：“你刚才谈的都很重要，至于谈什么和怎么谈，可以让你来决定，军事也好，其他也好。你可以谈延安或上海时期，革命怎么进展的，还有你一生的情况。”

江青：“如果你了解我的历史，那谈起来就长了。我建议先不写我，而写中国革命的书。如有

时间再写我。当然你也应该对革命过程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有所了解，不然我们怎么能保持革命青春，但必须加上革命。”

维特克：“自从我来华后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，特别是文艺方面了解得很充分。江青同志的作用在国外受到很大误解，对此我感到很难过，我想在今后的作品中予以纠正。我不是指外国人反对你，而是不了解你，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你。因为在国外材料很少。我认为我了解中国，我十分尊重中国的过去和现在，我感到你个人这方面的情况，应向外国人作出澄清。我愿做些事情，对此予以纠正，我对在外国介绍你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很感兴趣。我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，在这张白纸上可以写任何东西。”

江青：“我在过去起的作用也是很微小的。我是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。我 21 岁就一举成名，但我不要，我要找党。我受到政治迫害，外面受国民党的公开迫害，党内受坏人迫害。我是无名英雄，我甘心做无名英雄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相信，江青夫人，你长期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斗争，你也为此作出过很大的贡献，这些都是我非常想了解的内容，我相信这都是非常有趣的。”

江青：“今晚能否谈解放战争时期？因为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，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，不会枯燥的。不仅为你的书，也是为中国党、中国军队、中国人民。我好长时间想谈，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。别的问题，不瞒你说，广州的同志又搞掉了我两天时间，给 1500 人作个报告，给干部作的。我在这里是保密的。因为群众一发现就不得了了，我就休息不成了。”

这时江青站起身来，走近那张长方桌。那桌上原已摆上三张大地图，还有教书用的长木棒。她拿起教棒，又叫服务人员摆好录音设备。

江青：“先给你看看全国的形势图，看看三年半解放战争的图，得到一个总的概念，然后给你看看陕北的图，这样就容易理解了。你看共三年半的情况我只用了这么几张纸，而他（指张参谋）用了好多纸。但我感到累，因为好多年没谈这些事了，要好好回忆。”

维特克：“希望你不要把你搞得太累，我知道你正在这里休息。”

江青：“这对我也是一件愉快的事，多年来我一直想做这件事。这个战场的情况除了毛主席，只有周总理、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全面地向你介绍。此外还可把全国的情况向你作个大致介绍。先看看不同阶段的地图（指地图），这是解放战争初期、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形势图。

“解放后我经常下乡，1951 年下乡两次，为《武训传》连下乡到组织文章、自己写，花了 8 个月时间。我们还是让它上演，但一个批评，他们就收回去了，一篇调查报告，他们就不吭声了，解除武装了。

“1951 年还搞了 3 个月土改。

“日本投降时，敌后大部分国土在我们手上，不是在国民党手里。抗日战争主要是八路军、新四军打的，蒋介石躲在四川省峨嵋山。

“我准备送给你地图，通过这些图可以了解事件的发展史。要了解全国的情况，回国后还可看毛选。毛主席写了许多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，在第二、三卷可以找到，如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、《论持久战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联合政府》等。抗战结束时，我们有一百二三十万军队，老百姓 1.3 亿。蒋介石靠美帝用飞机、军舰运兵，来抢地盘，敌人 430 万，敌占区人口约 3 亿。

“你知道蒋介石有个绰号吗？老乡管他叫‘运输大队长’。当时美帝出面调解，所以有个三人小

组。双方都争取时间，我们也要跟他们和谈，我们的毛主席到重庆谈判，结果双方签订了《双十协定》。但毛主席到延安刚下飞机，蒋介石就撕毁了协定。很清楚，我们是要和平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外国人都了解这件事。”

江青：“所以我就不阐述了。（看图）看这三张形势图，130万对400多万，我们采取的战略方针是毛主席提出的积极防御。战略上敌多我少，战役上我们是多数，几倍于敌人，我们一定要吃掉它。所谓‘歼灭’不是肉体上的，而是解除武装。有些人死了，多数是俘虏，我们的俘虏政策你是知道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如果我说得对的话，你们不杀他们而是改造他们的思想，让他们认识错误，支持共产党。”

江青：“不完全这样。如果他要回家就给路费，留下的就参军，绝大多数不愿回去，因是抓壮丁抓来的，回去后怕再被抓。另外他们还是有些政治觉悟的。他们只要求给一顶帽子。（看到维做记录）不做记录不是更好吗？”

维特克：“我知道不能用录音机，所以拼命记。”

江青：“记录很累，记录时不能听到我讲的每一件事。”

维特克：“你能否给我录音带？”

江青：“可以。我不是说过吗？录音也是为你准备的。”

“在战略防御阶段，我们主动撤退了一些地方，这并不是说我们被打败了。如涟水战役七战七捷，歼灭敌人5.6万人，但毛主席下令往东撤。在延安也是主动撤。主席是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的，而是保存有生力量，抓住有利时机，歼灭敌人有力量。当时也有很大的争论，虽然还不能形成一条路线。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。撤退延安，当时有人不肯，以后怕坚持，要到河东去，认为那里安全，毛主席驳斥了这种观点。因为敌人是两拳头，一个在华东，我的家乡被打得稀巴烂；另一个在陕北，它直扑党中央，多9倍人，他们30多万，我们2.5万。毛主席说，敌人有腿，我们也有腿，我们的腿比他们更长。这是一点。另一点是中小城市丢给它，对它是包袱。敌人为了保卫大小城市就要分散力量，而我们的力量是集中的，你懂吗？不枯燥吧？”

维特克：“很有趣，我虽不是军事家，但从你那儿学到很多东西。”

江青：“那时我们是内线作战，也就是说，在根据地打。敌人打仗像瞎子，因为群众不向着他们，而向着我们。我们大部分地区是经过减租减息和土改了的。“抗战以后，国民党有3次反共高潮，它原来供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军费，后来不给了，要饿死我们。1939年开始不给东西，我们就上山开荒，我也上山开了半年荒，手上有6个老茧。毛主席提出‘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’。当时对女同志优待，例假休息两天，他们让我留在家里洗衣服，我不休息，坚持上山，顶一个中等劳动力，我不甘落后于男人。国民党想饿死我们，围困我们，结果我们吃得比过去还好，穿得更暖。你去过南泥湾吗？”

维特克：“没有，我读过，那是自力更生的模范。”

江青：“我去过那儿，在那里开荒。后来我肺部有问题，大夫不让我纺线，所以我织毛衣，一年上交十件毛衣，利用业余时间。社会上也织。男的种田，女的织布，实际上女的也种田，我就种田。”

维特克：“哪一年？”

江青：“1939年。1939年上半年开荒，上山穿大衣，下山穿单衣。别人比我做得更多，我不过其中之一，没什么特别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太谦虚了。”

江青：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（看图）这张图是关于战略反攻的，从1947年7月开始，关于每个地方怎么打，消灭多少敌人，都标在这些图上了。这些图是为你准备的。战略反攻时我军300万，敌人只剩290万，它处于劣势。毛主席采取中间突破的方法，插入敌人心脏。二野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从大别山向武汉进攻。一边武汉，一边南京，敌人无法招架。1948年底，蒋介石要同我们和谈，我们也和谈，蒋介石名义上下野，李宗仁上台，蒋介石实际上掌握实权。谈判结果签订了和平协定，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不签字，国民党谈判代表回不去了，都没回去，张治中、邵力子、章士钊等都养起来。张治中三上延安，是他的资本。有一次毛主席出外巡视，他也跟去，那年是1958年到1960年中的一年。

“西北战场，毛主席坚持西北战场，指导全国。党中央分成前委、工委、后委，这张图标了（敌人）从进攻到完蛋的全过程，每个战役的数字都有，我就不详细说了。如果你同意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然后吃饭。饭后再介绍西北战场的情况。”

维特克：“能否给我这些图的复制件？”

江青：“这些图就是为你的书画的，都是给你的。你看我把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都请来了。他也是跟我一起，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坚持在西北战场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那好，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的解释和图联系起来。”

江青：“今晚先把这个讲完，先讲三年半解放战争的概况，然后重点讲西北战场，这样可以讲得更生动，这就是我给你那本书所做的钢筋水泥的基础。工作非常累，因为得反复核实，拿出根据，别人驳不倒，这是历史，不能歪曲。”

维特克：“对任何提供的材料，我都很感谢。”

江青：“我告诉你的材料斯诺没有，今天我给你讲的比给斯诺讲的要深。我给你的这些材料很扎实。我搞了那么多样板戏，我自己没有实际经验，能帮助他们吗？我读了大量军事历史，不管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，甚至被歪曲的，我都读，单华北军区的历史材料就一大堆，我都读了，还到地方去调查，每个戏都要去调查。”

维特克：“经过军事研究，再打仗你们就容易得多了。”

江青：“一般人都知道怎么打仗，珍宝岛的战役就是没有打过仗的人指挥的。会打仗的人牺牲了，不会打仗的边防站站长出来指挥，只二十几岁，不满30岁，是我们党‘九大’代表，指挥得很好，叫孙玉国。”

这时已经到晚上9点了，江青站起来，拉着维特克的手说：“哎哟，说了这么多话，累了，也饿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咱们该吃饭了。”

江青：“今天请你吃广东饭，中国有句老话：吃在广州，穿在杭州，死在柳州。”

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，而广州人特别会吃。这是盐鸡，味道不错，还有清蒸鱼，这种芥兰菜只有南方生产……你最好同群众接触接触，到越秀山去看看，我现在不能去了，否则成了展览品了。我在这儿必须保密，因为广州军区要为我的安全对中央负责。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会给我

保密，所以我请你到这里来。”

维特克：“希望你有时间好好休息。”

江青：“对，我应好好休息。但我怕把电报和文件压得太久，怕落后。我应有责任，我在这里同你谈话，我对广州军区的讲话已经经过政治局批准，我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相信。”

江青：“当然我们不是从早到晚都很严肃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过去当我能同主席经常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谈各种问题，经济、政治、文艺等等，我们从来不枯燥。

你一定知道毛主席很会游泳，也很会打乒乓球。”

维特克：“这方面的照片我都有。最近我买了几幅毛主席打乒乓球的丝织画，我想带回去送给我爱打乒乓球的朋友。我知道毛主席早在 1917 年时就写过关于体育的文章。”

江青：“那时他的观点还不是马列主义的。毛主席对自己做过分析，开始他信孔夫子，后来他信资产阶级，以后感到这些都没用。五四运动时他是个领袖，带一个代表团去请愿。北洋军阀的总理叫靳云鹏，他拒绝见代表团，但代表团一定要见他。进去了，毛主席说过，当时出来一个人，这个人连话都说不清，后来这个人说，他就是靳云鹏，这个名字还得查一查。”

维特克：“这录音了吗？我怕丢了这一段，我可以记录吗？”江青：“不需要，有人替你记录，你知道我们为你负责，为中国人民负责，为世界人民负责。不讲假话。”

江青：“二七大罢工时，毛主席去长辛店。他是第一个到安源煤矿去的，去了好几次。他有个弟弟叫毛泽民也去过那里。毛主席搞工人运动、农民运动、学生运动和士兵运动和做其他各种工作。他常说，他是个老师，开始不会打仗，但是后来蒋介石杀人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拿起枪来。开始老打不了胜仗，后来总结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和建立根据地的政策。不存在天才的问题，只是有些人更聪明一些。当然也可以说天才，但出生后要经过实际经验和锻炼。对不对？毛主席有丰富的斗争经验。”

维特克：“对。经验非常重要，一段时间后要总结经验，然后回到实践中去。”

江青：“要回到实践中去。”

维特克：“通过访华几周，我体会到这是十分正确的。我参观过业余体校和艺术学校，我看到那里的孩子们也接受正规教育，提高水平，当然大学就更强调实践了。”

江青：“当然在总结经验时要提到两个方面，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。（见维忙于记录）别担心，有人替你记录，只要你好好听我说，并放松些就行了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现在已经放松一些了，我在考虑刚才江青同志讲的内容。”

江青：“有像你这样一个女作家是好事。”

维特克：“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”

江青：“不管你的书写得全面还是不全面，都可以反映中国革命，总之你会尽最大努力写成有分量的书的。这对中国人民有利，也对其他国家人民有利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现在已认识到这一点。”

江青：“举个例子，战略上我们以少胜多，在战术上以多胜少，这个原则给世界人民带来希望，给全世界带来希望。我会更具体地谈这一点，这样你就可以懂了当我们初到延安时（那时我还不认识毛主席），毛主席到处作报告，因为那时有人要封锁他。一听说主席要作报告，革命青年就设法去听，不管地方多远也要去。”

这时江青突然站起来，举起酒杯，对维特克：“来，来，来，我们大家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！为你的健康，为你那本书的顺利出版而干杯！”

“听说一跟你谈战争，你就感到枯燥，一会儿我再跟你谈这个问题时，我想你不会感到枯燥了，因为就像写小说一样，真实生活就是那样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这很重要，因为那时每天都要作出决定。”

江青：“这也是中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，遵义会议是个关键，洛川会议是个关键，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都是关键。这些都在毛选中。要是那时没有坚持在西北战场而撤到河东去的话，我们就会像被赶鸭子那样赶出来，被敌人消灭。毛主席带头坚持在一个战场上，而且指挥这个战场，指挥全国。当时周恩来同志是他的得力助手。周恩来同志原来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彭德怀担任一野司令员。所以 1947 年解放战争时期，周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代理总参谋长。他（指张参谋）对这个就不清楚了。”

维特克：“你 1933 年入党，作为一个青年，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？”

江青：“责任很大。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。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。因为穷，几乎给流氓骗了。当然他不能骗我，但欺侮我。”

维特克：“什么样的流氓？”

江青：“有一次我弄了点钱，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，是日本船。我的朋友送我，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，让他在船上照顾我，因为我晕船。我坐过三次海船，还爬过崂山，爬山我是老虎，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。坐船是狗熊。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。我晕船，吐。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，他就起坏心了。他说我们到上海，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，我们开旅馆去。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。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，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。如果没有人来接我，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，那是我当时的想法。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，因为要住那个旅馆，先得交 15 块钱的押金，所以我就绝望了。总向外边看，也不晕船了。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，提着我的小行李，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，我没有理他。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，我决心叫黄包车。就在这时候，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，我什么都忘了，高兴得跳起来了，把那个坏蛋也忘了。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。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。”

维特克：“你逃掉了。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，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。”

江青：“文化大革命期间晋东南打得一塌糊涂。有一次，我开完会后读了一个文件，总理叫我休息，在人大大会堂。突然间许多人拿着地图等东西进来。郑维山和他那一伙说，现在我们有权利开枪扫荡。那时两边都有几万人。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，当时还不知道。我说，那怎么行，两边都有几万人，不考虑人民的生命财产怎么行？他们说，我们现在宣传没用，要派坦克，挖战壕。我说，我要派比你们更多的军队，但远离现场，在坦克装扩音器。当时总参的副总参谋长也在那里。吴法宪说：哎呀，江青同志你也知道怎么打仗呀。我说：‘我跟随毛主席几十年，连这点事还不知道？不能开枪。’总理支持我，半夜里总理打电话给我说，你的办法很有效。这以前榆次县开枪打起来

了，但我不知道，是突然袭击，我 1967 年 9 月 5 日的讲话把这股风刹住了。”

维特克：“你刚才讲的情况对理解你 9 月 5 日的讲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。”

江青：“因为陈伯达的破坏，那次讲话是分好几次讲的。主席当时不在北京，在外地视察。所以他们动员了一些人层层包围中南海。”

维特克：“最好能把你的提纲给我，因为我只作了简单的记录。”

江青：“我只能大概地告诉你，这件事发生在 1967 年，具体日期还要核对。你应对你们的读者负责，所以你要知道年、月、日。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纠正呢，因为我要核对数字，不应该让谬误流传。比如说，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，那是假的，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，那是假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知道那是假的。”

江青：“那完全是假的，完全是王明捏造的。当时有人反对的，项英就反对，他甚至打了个电报。他是个叛徒，那时还不知道。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，毛主席回电说，‘我学孙中山’。”

维特克：“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 15 年了。”

江青：“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，约 30 岁。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，是她要求离婚的，我不愿和你讲这个。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，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。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。她非常固执，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，不关心毛主席。”

维特克：“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？”

江青：“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，她马上就要进去，毛主席不愿意。她自己的家是地主，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，当时毛主席不知道。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，我不太清楚，也不问毛主席。你书里不要写这些。”

维特克说：“不写。这和革命没有关系。”

江青：“她什么工作也不做，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。这是很大的矛盾。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，给老百姓，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，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。她要求去苏联，让她去了，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，非常艰苦。她打孩子，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，把她关起来了。她本来有个男孩，毛主席很喜欢，她也丢了。毛主席说，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。”

维特克：“什么？她有个男孩？”

江青：“她把那个男孩放在一个农民家里，自己到莫斯科去了。她在莫斯科精神失常，被送到精神病院。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知道。”

江青：“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她，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。她还活着。她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，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。他们还用‘电疗’治疗。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，生活很艰苦，她感到很烦。她在莫斯科说，我是休养来的。但苏联人说，不劳而获是不行的。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的。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，李讷是我生的，他们都随我的姓。”

维特克：“杨开慧被杀害时，毛主席还有一个妹妹也同时被杀害了，是不是？”

江青：“我不清楚。总之，他有一妹妹也牺牲了，不是亲妹妹，是堂妹，叫毛泽健。有个展览，看了就知道她是怎么牺牲的，你也可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愿去。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？”

江青：“是的，她随我的姓。”

维特克：“谁把她带大的？”

江青：“她母亲在苏联，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，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，然后找到这个孩子，她不愿意跟她妈妈，愿意跟我们。她早就结婚了，现在有两个孩子，她学自然科学。李讷是你的同行，学历史。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，是我当儿子养大的。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，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，我不大清楚。他是造反派，参加过武斗，他还没有结婚。李讷比他大半岁。”江青离开房间，过了一会儿又回到桌边。

江青：“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？哈哈，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，从前呀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可是富于感情的，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。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，我可不背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。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，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。我最喜欢上海，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，有点道理。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，那真是非常有味道，我还唱哩，唱给你听听……”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：“我呀我的小妹妹哩，舍不得离……啣呵呀啣唉……哈哈，哈哈，哈哈。”

江青娇笑着说：“有意思吧，是不是？”

江青：“我一到上海呀，男朋友可多了。喏，就是追逐我的人，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，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。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，现在又被打倒了。哈哈，还是不说他们吧。有趣的一次，是你们美国人，是一个水兵，也许是喝醉酒了，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，向我迎面走来，他站在我面前，挡住我的路，向我敬了一个军礼：两脚一并，咔嚓一声。我回头想走开，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，双手也伸过来了，哼，想占便宜！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。他还是笑嘻嘻，又是咔嚓一声，敬了个军礼，还说对不起呢。你们美国人，还是懂礼貌的……”

饭后，大家又回到客厅。我悄悄走到江青身旁说：“刚才维特克女士向我表示，她听不懂战争，希望你能讲点别的，有关你自己的事。”

江青坐下，慢吞吞地对着维特克：

“我讲的战争故事，不是非常有趣吗？你不愿意听？这就是我的事呀。西北战场的战争，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。”

维特克：“江青夫人，我非常有兴趣，只要是关于你的一切，我非常愿意听，听不懂，我可以学，是不是？这是你刚才对我讲过的……”

江青：“这就对了。（指图）这个图是毛主席的行动路线图，当时中央和野战军不在一起。那是1947年，斗争很尖锐，斗争从1946年开始，到《双十协定》撕毁后斗争更激烈了。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，我们主动撤离一些城市，留给敌人，这样敌人背上包袱，而我们的主力就有了主动权。我们集中主力，敌人不得不分散力量。我们尽可能在内线作战，也就是说在我根据地作战，诱敌深入，然后指挥敌人到一个地方，搞个口袋叫它钻进去。现在谈起来很容易，但当时转这个弯很不容易。那时撤离张家口不容易，撤出延安也不容易。很多人不愿意，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，

当然也有坏人的捣乱。中央那时决定要撤到后方去，那个决定是在王家坪作的。有些好心同志动员我去向主席讲讲，留在这里多危险呀，我也很傻瓜，就去说了。毛主席说，你是胆小鬼，你就走。我很冤枉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我是坚持留下来的惟一的女同志。我认为在艰苦的战争年月，应该有人照顾他，应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。开始毛主席和我带着李讷行军，李讷与你同岁，带孩子行军以示坦然。李讷当时六岁，白天还好，夜里行军孩子睡了，就不好办了。软了，甚至几个人都没办法对付她，更甭说一个人了。后来我就求毛主席，带着孩子不行，后来就让她与邓颖超同志一起过黄河，所以李讷一直叫她邓妈妈。我事先做好工作，她答应过河，但过去后，睡醒一觉，哭起来要回来。我就跟你讲这么多。

“撤退以前，敌人对我们进行所谓战略轰炸，动员约 50 架飞机，都是美国的 B24、P52，都是轰炸机。我们一个人没死，我的孩子还在防空洞里唱歌。直到炮火已能看见了，所有人才都走了。当时敌人两个拳头进攻，一个兵团叫刘戡，有七八师，另一个兵团叫董钊。两个拳头都向着延安。在宝塔山上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们能看到炮火，敌人距延安只有 15 华里。我们从飞机场穿过，还唱着军歌，你感到枯燥吗？刘戡是二十九兵团的，董钊是一兵团的，后来这两个人都被我们打死了。毛主席那时有一辆吉普，第一天宿营，汽车伪装不好，车被子弹打穿，从此丢了汽车。在那个地方搞伪装很困难，敌人的飞机俯冲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搞防御工事，他们往下看到有东西就轰炸，连续丢了 3 个这么大的炸弹（用手作比）。一个是穿甲弹，一个是爆破弹，一个是燃烧弹，都是美国人送的。我才不怕飞机呢，躺下就行了。扫射没有掩体，危险。敌机轰炸很厉害，一次孩子找不到了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轰炸过去后，发现李讷好好地在老百姓家里玩呢。李讷与李敏的名字是对着的，‘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’。”

维特克：“好名字，个性是否符合？”

江青：“不完全，李讷像你一样是学历史的。在学校是全五分的优等生，越学越蠢，所以我把她赶到乡下去，后来到了军队造反去了，叫她做了军报负责人。她说不愿当阿朱别依，又造反，到乡下去。林彪集团迫害她，差点没把她绑架走，绑走了另一个像李讷一样戴眼镜的。李敏也是造反派。对李敏我尽量避嫌，她是‘一六’的头头，国防科委的。去年到青岛我见了她，又是罪名，罪上加罪了，我只好都不见。”

维特克：“为什么叫犯罪，什么罪？”

江青：“他们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。王秉璋是林彪的干将。其实她没告谁的状，她讲了聂荣臻的事，我说聂荣臻同志是保护对象，是爸爸保护的人，我们都要保护。但她回去后，大家都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。李讷去军报时，说李讷夺了他的权，因为军报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阵地。”

维特克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江青：“他们是指林彪一伙。总之这两个孩子跟随父母干革命。我说男孩子更好。我的女孩子吃醋，说我偏心，重男轻女。家里事谈多了没意思，还是谈西北战场吧。”

“敌人在西北战场是 23 万人，我们的军队是 2.5 万人，包括两个纵队，八个野战军旅。纵队司令一个叫王震，一个叫张宗逊，都是一野的，一野的司令员是彭德怀。我们撤离是主动的，有计划的。每天夜行军，很冷，冰有一尺多厚。我们是在 1947 年 3 月 18 日下午 6 点开始行军的，每天有记录。19 日我们住在刘家庄，吉普车中弹。3 月 21 日到高家涧，每天夜行军，毛主席在这里组织青化砭战役。这时毛主席决定把中央分为前委、工委、后委。前委为毛主席、周总理、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；工委负责人是刘少奇；后委负责人是叶剑英同志。那时周恩来同志也过了黄河去安排这些机关。毛主席向西跟敌人周旋。每天夜行军，我们与敌人隔一山，叫隔山行军。中央机关代号‘三支队’，我是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。中央机关有 4 个大队。每天夜行军，十几岁的青年特别想睡觉，甚至站着都能睡着。我有匹马，小通讯员拉着马尾巴走走就睡着了。每到晚上 3 点就想睡，条件反射，一到 3 点就支持不住了。把所有革命歌曲都唱了，不让自己睡着，以免跌下马来。

我有高酸胃炎，行军中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，变成了低酸胃炎。这里要提一个人，应该纪念她，就是斯特朗。斯特朗要求与我们一起行军，由于她年纪太大，就劝阻她。全国解放后她又回来了，这说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没有间断过的。

“3月31日到邱家坪。每小时行军有10分钟休息。休息时我看见警卫战士不仅戴国民党的帽子，还戴国民党帽徽，我非常生气，说‘摘下来’。我从来没有戴过国民党的军帽，毛主席也没有戴过，我只是戴八角帽。为戴这八角帽子还大吵了一次。有一次我戴了好几天了，别人强迫我摘下，我非常生气。在延安党校别人要取下了，我大哭了一场，后来只好组织上服从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共一合作就不能戴八角帽。”

维特克：“为什么他们要你摘下这种帽子？”

江青：“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者，他们说既然国共合作了，就应该戴国民党的帽徽。他们没想到我们是共产党员，八路军、新四军不同。我让摘下国民党帽徽的战士们说他们不敢。我说国共都打起来了，内战已经爆发了，你们还不敢？我负责。大家把国民党的帽徽摘了，生气地扔了。但行军中找不到红星来代替。那时警卫部队属于正规军，中央警卫部队不到两个排。

“这以后都是和敌人隔山行军。严寒，非常冷，我们向三边走，中间休息10分钟，战士们都得踏步。我穿皮衣、皮裤、皮大衣都冷得发抖。做饭的同志拿小瓶酒给大家每人喝一口，我一喝浑身都热起来了，但不久又冷了。每天傍晚行军，拂晓宿营。

“4月5日到达青羊岔，接近三边了，这是古战场。三边有三宝：咸盐、皮子、甜甘草。

“4月9日开会，毛主席向全党发出通知，即《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》，指出蒋介石占延安和陕甘宁边区，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，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。

“《通知》号召全党全军坚决以战斗精神保卫和扩大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。

这时毛主席改名李得胜，周恩来总理改名胡必成，就是一定要胜利，一定要成功。中央机关改为‘九支队’，还是4个大队，中央后大队是其中之一，我是这个大队的政治协理员。

“4月12日到王家湾，距敌人只有20华里。在这里我们住了将近两个月，直到6月7日。几个人挤着住两个窑洞，我和毛主席住里面，总理、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住外间。他们一开会，我就到驴棚里。有好多虱子，别人都知道怎么抓，但我不知道。我更多时间是在做群众工作和找别的工人做，所以长虱子。那张照片说明毛主席怎么接近群众，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。在王家湾时，我又瘦又黄，肩上老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一天做群众工作回来，毛主席说，啊呀，不得了。警卫员把炕沿揭开，发现好多臭虫，臭虫把我咬肿了，吸了好多血，后来我们把它的大本营消灭了，但不可能全消灭，因为那个地方不久又有了。当时在中央有斗争，即陆定一老要到河东去，任弼时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意他，但任弼时同志是个好同志。他们一直吵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毛主席总对我生气，我不知道怎么好，但我感到气不是对我发的，逐渐也就习惯了。在王家湾开始组织几个战役。羊马河战役全歼敌整编135师，俘虏旅长以下4000余人。

5月4日蟠龙大战，全歼敌整167师欠一个团，俘敌正副师长以下6700余人，是胡宗南的嫡系，缴获白面1.2万多袋，军衣4万多套。这时毛泽东主席曾派周恩来同志，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，到蟠龙祝捷。在王家湾毛主席写了《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》，指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，蒋介石政府的强大，只是暂时表面，其进攻是能够打败的。中央直属支队从一开始行军就有两派，一派坚持相信毛主席的指示，一派认为敌人力量强大。那一派认为国民党地大物博，人数众多，又有帝国主义帮助；我们地区很小，尽在山沟里转。我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，马克思强调改造世界，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同样的东西，不论是棉花还是铁，是钢还是别的东西，在不同的人手里效果不同。蒋介石的军队打仗没有目的，他们只是国民党

的炮灰。他们虽然东西多，但到头来还得送给我们，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。虽然我们人口少，但一个顶一个，有时一个顶十个，所以我们必胜。当时两派辩论非常激烈，在中央直属大队里，这个斗争一直到河东。

“6月7日到小河，这时敌人向我们运动了，我们住了很长时间。那天下雨，主席不进窑洞，看到每个战士都宿营以后他才进，也没有雨衣，只有我有件雨衣。6月8日这晚的行军可以描写一下。从小河向田茨湾走，都是山，下大雨，走了一整夜，脚下几十里，实际只有几里，因向导迷了路。国民党军队胆怯，他们宿营在山上点篝火。我不想给主席和他的警卫员增加负担，故意落在后头。我们怎么行军呢，我们手拉着手，排成一行，因为什么也看不见，又是风又是雨。扑通，我的头碰到一个同志背上。扑通，另一个同志的头碰在我的背上。连说话也得小声，因为敌人离我们非常近。天还不亮，雨小了点，前面传口令说毛主席找我，在山边等我。行军以前我求毛主席同意了穿我的雨衣。我穿一件斗篷，是战利品，是日本大衣，可当雨衣穿。我告诉毛主席，这可以当雨衣，你就穿我的雨衣吧，你一定要穿，否则要感冒的，我怕他感冒，他同意了，那天穿上了我的雨衣，这是我的胜利。在山边见到毛主席。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，拴在皮带上，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，倒水给主席喝，给我喝，再给警卫战士喝，都在一个杯子里。天亮了，我们找破窑洞休息。我们人很少，周恩来同志笑着问我怕不怕？我说这算什么，有200多人，还有枪，我在白区工作都是独自一人，有什么怕。9日黄昏到田茨湾，这里住了一周，敌人退却了，不敢再接近我们。6月16日我们又回到小河。敌人到了王家湾、小河就不敢前进了，刘戡住在我们住过的窑洞里。”

维特克：“你们为什么又回到小河？”

江青：“因为敌人已撤退了，我们要去坚守，我们去慰问王家湾的群众，帮助他们坚壁清野，帮他们撤退。还是有些老百姓给国民党抓去了。王家湾的老百姓到小河去要我们回王家湾去，他们哭着说国民党待我们不好。我们说怎么不好，他们说没让我们吃白面。白面是陕北最好的饭了。行军前王家湾附近的老百姓来到我们窑洞里，都要跟着我们走，其实我们已安排政治部负责这项工作了。他们一定要跟我们走，因为当时很恐慌。有个还乡团的老头，儿子在榆林，见了敌机就鞠躬，他藏了很多粮食，后来老百姓把他捆上带走了。谁想到他藏了这么多粮食，过去谁也不知道他这么反动。”

维特克：“窑洞是给你们准备好的，还是房主让给你们住，部队走后房主再回来？”

江青：“他们给我们腾出来的，因为已经土改了，农民分得土地和窑洞。我们住在一个贫农家里，他有三孔窑洞。这家夫妇有两个孩子，他们自己用一个窑洞，给我们两个，我们每人一块床板。我们采取了下面的措施，我们一部分向东（佯动）把敌人往东引，并有中央警卫队派出小分队到安塞打游击，这是敌人心脏。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游击队。有个后家沟，我去过。当时我们要分散，必须找住处，所以我去了，地形很有利。一个人俘虏了七个敌兵，这一定是真的。我见过这是真事，报纸登过。山沟里有个地方像地道，两个山连在一起。一个民兵干部，看到山沟里有七个敌人，都带着枪，正赶着老百姓的牛羊，他看到敌人抢老百姓的东西很生气。他很勇敢，喊缴枪不杀，然后又轻轻跳到沟的那边变个声调，喊缴枪不杀，敌人吓破了胆，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，就举手投降了。一个人俘了七个人七支枪，还缴获了许多东西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故事，可写小说。敌人很多得了关节炎，因为他们不敢睡窑洞，睡山顶上。我们一直睡窑洞，游击队也住窑洞，谁愿睡山上。”

“群众不向着他们，为我们保密。他们分析我们这个军队有几多：短枪多、马多、手电多、皮袄多，此外还有个女的多。他们分析了一阵后，看到毛主席：啊，这是主席。为替我们保密，他们从那时起就称毛主席为‘他’。所以毛主席的代号是他。不管你怎么说，他们不说话，就说他。群众就这样替我们保密。他们见了我什么也不问，如果谁问‘他’是谁，他们都不说。敌人打瞎子仗，因为群众不在他们一边。而我们对什么事都很清楚，因为群众在我们这边。上次有没有给你过毛主席为什么能同时指挥两个军队？群众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条件。”

“开始你认为谈军事很可怕，现在不觉得那么可怕了吧？你看我不是走过来了吗？”

“我住在这儿你应保密，因为这是边界，广东省负责同志要对中央负责，我不在乎。上次我是4月份来的，一下飞机腿很不舒服。那时人不多，我就下车走走。不久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，他们喊呀，喊呀，糟了，我被发现了。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，都是中学生，他们后来走了。事后没有人传我在这里的消息。‘五一’我公开露面了，报纸也登了，这以后香港报纸才报道了这个消息。群众会保密的。”我们在田茨湾住一个星期，那里有7户人家。我住那里做过群众工作，有一件事印象很深。有个雇工，分到30垧地，一垧是3亩，但还是个雇农，他没有牛，没有农具，什么都没有。陕北群众生活很苦，不出棉花，一年收获的粮食2/3花在穿上面。他们没有见过这种线，我们纺的。群众看见我头上扎头发的线高兴极了，因为当地群众都用羊毛纺线，他们习惯用羊毛线。结婚的妇女梳髻，未婚的梳辫子女的我老摸我。陇东的妇女很漂亮，我们去过的地方的妇女都很漂亮。”

维特克：“他们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？”

江青：“都是汉族，我们没有去过少数民族地区。根据她们的习惯，妇女总爱在脸左或右边留一撮头发。我们住的那家有个姑娘叫兰兰，他们还有个女儿叫桂花，桂花的父亲是个招郎，实际上是长工，土改分给他很好的窑洞不敢住，怕老丈。”

“地主讨了许多小老婆，实际上都是奴隶，解放后每个小老婆都分得了一份地。”

“6月16日，我们从田茨湾又回到小河，一直住到8月，约一个半月。这个时期我们一野先后在陇东、三边打了两个战役，这两个战役给宁夏、青海马家军（马步芳、马步青、马鸿奎）以沉重打击，收复了陕北甘宁边区西部广大地区。这时全战场也取得重大胜利。我军经一年作战，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，共歼敌正规部队97.5个师，连同部分非正规军共112万人。”

维特克：“你们对这些人怎么办呢？”

江青：“多数补充到我们的军队。首先进行思想教育，然后通过忆苦三查，他们不愿回去了，让他们回他们也不回，因他们的家乡还在国民党统治区，他们愿跟我们军队去解放自己的家乡。他们打仗都有个明确的目的，解放自己的家乡，推翻土豪劣绅，分土地报仇。大多数国民党的兵都是劳动人民。他们是给绑着抓走的。”

张参谋：“俘虏兵什么也不要，只要顶帽子，就参加我们的部队打仗。”

江青：“边区人口很少，前方需要补充，所以俘虏经教育，一周以后他们就上前线，打得很勇敢。那时我们军装不够，所以供不起军装，只给他们一顶帽子。我们的战士打仗时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。”

维特克：“上边提到的三马和你们行军有没有关系？”江青：“有关系。他们非常顽固。比国民党的兵更厉害，更凶。我们把他们的后方扫荡以后他们就没法了。他们有很多骑兵，行动很快。”

维特克：“红军去过的大部分地区都得到支持，他们为什么反对红军？我记得在《红旗飘飘》里读过三马的事。书里说他们也支持红军。我不明白他们反对的基础是什么，他们是反对汉人还是由于宗教或其他的原因？”

江青：“什么都不是，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，这是个阶级关系。不是所有的回民都反对我们。三马的军队是向着蒋介石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他们是不是和国民党合作？”

江青：“他们有关系。”

维特克：“国民党给他们军事装备？”

江青：“他们不太听话，他们要独立，是杂牌军。国民党给他们一点东西。因为国民党要控制他们，所以他們要独立。宗教是次要问题。他们军队的头子是反动的，都是大资本家。

“《红旗飘飘》大都不可靠，读时要小心，要分析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把《红旗飘飘》当参考资料。”

江青：“不行，不行。”

维特克：“当参考资料也不行？”

江青：“比如有个作者叫王超百，是国民党特务。他给《红旗飘飘》写了许多文章。有的是别人写的，他拿过来自我吹嘘，有的歪曲历史，你必须非常小心。当然我们不是全盘否定它。我没有把《红旗飘飘》那几本书都读完，我读到中间就发现这些问题。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懂了。‘胸中自有雄兵百万’的作者闫长林曾是毛主席的警卫员，我认识他。他没任何写作能力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写文章，他请了报社的人帮他写。他有的地方写得好，有的地方不真实，因为是别人替他写的。如写小河向田茨湾行军，明明敌人在山上宿营，但他说山底下都是敌人，其实敌人都在山上有篝火，这不真实。他对我个人报道也不正确，说我给主席做鞋，实际上我做政治工作，在争论中我是一派的头。他也知道我在那里是做群众工作的，他不提这个，而说我给主席做鞋，我从来没给主席做过鞋，这是歪曲。

维特克：“可能他有偏见。”

江青：“他是我的部下，他对敌人估计过高了，害怕他们，否则他不会那样说。很清楚，敌人在山里，我们周围山上都是敌人，但敌人不知道我们就在山腰，如果他们知道，他们就下山抓我们了。我们只有 200 多人，敌人怕我们。闫长林描写的事实刚好相反。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小例子。”

维特克：“因为我们材料很少，很难区分正确和错误，所以有什么材料，就信以为真。这也看到材料少的后果。除非有材料证明，那是错误的。”

江青：“主席在《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》一文中总结经验时说，97.5 个师 112 万的战果就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的基础。毛主席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决定召开前委扩大会，也叫小河会议，专门讨论和布置了全国战略反攻。第一年是战略防御阶段。前委实际上是中央机关这时将代号改为九支队。中央警卫团改为三团。8 月 1 日以后开始行军，沿着这条路走（指地图），这是急行军，一般来说每小时行军 10 里。8 月 13 日经绥德没有停，到延安岔，8 月 14 日离去。15 日敌占绥德。这次行军，前有 7 个师拦截，背后和左边也有敌人。形势看来很紧张，敌人是‘赶鸭’战术，要把我们赶往河东。那年比较早，但一开始行军又下起雨来，老不停。敌人非常残暴，所到之处，鸡犬不留。因为旱庄稼很矮，敌人放牲口去吃。我们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，帮助群众藏了很多粮食和其他东西。8 月 15 日后还是急行军。8 月 17 日到达白龙庙，当天中午到佳县城下，这是个有名的地方。我们坐在一片果林里休息，我买了水果给主席吃。当时的敌情是，一路敌人从吴堡来，另一路从榆林、横山来，逼近米脂，是敌人的主力军。他们打算夹击一野，逼一野和中央机关渡黄河。根据张参谋的记忆，主席在那里开了会。敌人距我们只有 15 华里，那时谁也不知我们应向哪个方向走，是从东往西还是往南。机要室一个人端一碗饭说要到河东去吃，胆小鬼。毛主席突然下令直插佳芦之间，中午开了个会。敌人以为我们到河东了，但是我们的战士还是想出了办法，他们把白龙庙拆了，很快就把桥搭起来，过了河，又拆桥，敌人过不去了，全队安然渡过去了。这不是主力，是中央机关。敌人以为我们到河东去了，他们一直想赶我们去河东。

8月19日到梁家岔，主席亲自到前方用电话指挥作战，部署沙家店战役。有一个电影描写这一战役，但由于作者缺乏战斗经验，所以没有描写战斗，只写了粮店和后勤工作，电影拍得不好。梁家岔是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打榆林是彭德怀的意见，毛主席勉强同意了，但打不下来。毛主席命令部分部队佯攻榆林，叫主力悄悄退回，然后把部队布置成一个口袋，攻沙家店。国民党主力36师是军建制，我们2万多人埋伏在沙家店，仅沙家店一战，全歼整编36师（胡宗南的主力）。沙家店战役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反击的开始。西北战场发生了急剧变化，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反攻的开始也就是反攻阶段的开始。8月23日到朱官寨，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，没东西吃，吃干豆角，干豆吃了胀气。日子不长，大家情绪很高。

毛主席写了《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》，规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：‘举行全国性的反攻，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，将战事引到国民党区，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。’在这里前委机关代号改为教导旅，总理兼旅长和政委。9月21日动身走了，23日到神泉堡。前委机关住这里。毛主席到佳县时，群众看到很激动，都流泪了。因为他们遭过敌人的蹂躏。在这之前，8月18日到谭家坪，参观了峪口造纸厂。群众见了还是哭，仍说‘他’。10月21日走到南河底，游白云山。29日到吕家坪。我从佳县过河接李讷，骑马到双塔附近山西的三交。这时邓大姐也到别处开会，只有一个女保姆，还有后方机关。11月1日回神泉堡，与主席登上佳县城墙看九曲黄河，并向西看延安，对延安很留恋，但那时已要去指挥全国战斗了。

我们在神泉堡住了十几天，主席写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》（即《双十宣言》）、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命令》。在《双十宣言》里，主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。中央直属队作了忆苦三查运动。四个大队，三个大队的领导都垮了。我们这个队，我是协理员，我们很厉害。让下面先查，最后我忆苦时，战士们都哭了。11月14日转移，从阎家崓到乌龙铺、申家岭、杨家沟。乌龙铺群众看到毛主席，一拥而上。我们在这里住了将近4个月，有很重要的文章和会议。中央于12月25日至28日召开了扩大会议。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的报告。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口述，我记录的。这个报告是打倒蒋介石、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各方面纲领性文件。在此期间，全国各野战军先后进入新式整军运动，即忆苦三查。各解放区土改运动蓬勃发展，革命进入新高潮。为了使党的路线政策深入贯彻，毛主席在杨家沟还写了一系列光辉文献，都在四卷内。

“1948年春，我们经过新式整党整军后，在各战场展开强大攻势，战争中心转移到蒋管区、华北地区，已把晋察冀、晋冀鲁豫、山东渤海区连成一片，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。正在这时，西北野战军攻下宜川，一野主力也打到蒋管区，打死刘戡，29军的头。这时毛主席与中央机关坚持陕北的目的已胜利达到。经中央决定，前、工、后委又合起来，计划3月21日离开杨家沟，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。3月21日到吉徽店。23日经川口渡黄河，经碛口到寨则山，到双塔。3月26日到蔡家崖住了一周。4月4日到苛岚，这时又坐吉普车了。4月5日到神池。4月6日到代县。经过繁峙到伯强庄。下雪，差点过不了山。因五台山是很高的，常常大雪封山，如果那天不过山就要再拖到第二年化雪后才能过。就在这里，主席写了《再克洛阳后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》，主要规定了我党、我军在解放城市时的政策。1948年4月11日过了五台山。上山气压太低，下车后一步也走不了。一过山呼吸就好了。雪很深，踩下去一步还退一下。最高处不止3000公尺，有的地方有3000公尺高。毛主席身体很健康，他下车是为了帮助我。4月11日经过五台山，到杨林街，浏览了五台庙。庙非常大，走不完。13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，敌人飞机跟上来了。有内奸用电台指挥敌机轰炸。每个炸弹有25磅，5~10个捆在一起。18日到达花山，敌人盲目轰炸，对山上的白杨树也扔很多炸弹。毛主席在花山写两篇光辉文献。1948年4月18日，周总理到西柏坡打前站。毛主席5月27日到达西柏坡，即今天的平山县。毛主席在西柏坡住了10个多月，写了大量光辉文献，直接组织指挥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。亲自主持召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，制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的基本政策。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纲领。1949年3月25日，毛主席离开西柏坡经保定到达北京，并在西郊机场检阅了部队。

“着重讲一下三大战役。主力决战，只给数字。辽沈：歼敌33个师，47.2万余人；淮海：歼敌

5个兵团56个师，55.5万人；平津：连消灭带起义，第39兵团，52万人，共歼158个师，154万余人（正规军）。这时敌军290万，我们300万军队。国民党要求和谈，蒋介石下野，李宗仁上台。但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。毛主席1949年4月20日下令，向南方和西北进军，坚决、全部消灭蒋匪帮，提出保卫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口号。4月21日，百万大军下江南。4月23日解放南京，全面进军，风卷残云，消灭190万正规军，另98万土匪。起义的有120万人。至此，除台湾外全国解放。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毛主席当选为国家主席。”

维特克：“现在感到越来越清楚。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为一个外国人服务。”

江青：“为中国人，信任你，相信你能写好书，我不信一个女同志不能写好书。”

维特克：“我原则上相信这点。”

江青：“你到联合国代表团去要求，谢伟思也介绍你来。见你以后，你给我印象是好的，你对中国人民友好，对世界革命……你不仅是个好的美国人，也是个好的知识分子。”

维特克：“这是我最大的弱点。”

江青：“人是变的，但天不会塌。希望你逐渐进步，千万不能骄傲。‘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’。鲁迅讲：‘我经常解剖别人，更多的是解剖自己。’你对鲁迅看法不正确，可以举例子，反对托洛斯基。有西北战场的经验，才可以理解主席长征和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河，那是为了甩掉强敌，其中一次在贵阳，两边强敌，毛主席出其不意，中间插入。我没有长征经验，但在西北战场跟随主席知道如何对敌调来调去。”

维特克：“也许当我整理加工这些材料后，发现问题再来请你澄清。这些不仅够一本书，而是够几本书的材料。”

江青：“你知道我不是光搞文艺的了吧！”

维特克：“任何人不会像江青同志文艺上有才能，在舞台上能表现。有革命朝气的人不会是只搞艺术了。我开始从表面，进入肉，现在进入骨头了。”

江青：“今天重头戏过去了，以后可开神仙会了。今天9个小时多了，我也要睡大觉了，明天游泳后再开神仙会。”

维特克：“你把解放战争战略阶段一步步谈了，很清楚，下步你怎么谈？”

江青：“鲁迅，延安文艺座谈会。你还想了解什么，我可以重点告诉你。一生虽不长，也够曲折复杂了。你想了解的30年代都可以谈。”

维特克：“谈王明路线是很重要的。”

江青：“十次路线斗争，平均五年一次。陈独秀、李立三、瞿秋白、罗章龙（包括王明路线，但又是单独的），王明路线最严重，四年，他在莫斯科遥控，派人到根据地里全面夺权，对于这些情况你不知道怎么行？我是王明路线中期入党的人，他那货色我都遇到了。我对王明路线有深刻印象。从高岗、饶漱石、彭德怀、刘少奇到林彪，我都可以对你说得清楚的。”

维特克：“在今晚的长征中，江青同志仍是走在前面。”

江青：“很少谈这么长的话。”

维特克好像突然惊醒了似的，赶紧跑到大桌子旁边，抢起那些地图：“这些都是送给我的吧？江青夫人，对于我这真是太宝贵了。”

江青：“是送给你的，不忙拿吧，我让人给你送去。你拿着不方便。”

维特克：“还是我自己拿走好，这些对我了解你的讲话是非常有用的。”维特克双手紧紧抱着那几卷地图，走出门外，登上了汽车。